

# 献给信仰与光明的赞歌

## ——电影《1921》和电视剧《叛逆者》的叙事美学

文/王雪瑛

当演员黄轩凌展发微博长文书写自己演绎共产党员的万千感慨，当观众看完电影《1921》，在心里单曲循环着《国际歌》，还有那创造新世界的誓言；当演员朱一龙在微博上告慰林楠笙，你们奋斗和向往的美好生活已经到来，当观众看完《叛逆者》，依然牵挂着林楠笙与朱怡贞是否还能重逢……我们见证了两种叙事高能，激情可燃的红色题材影视剧的新形态和新境界：既有史诗式的宏大叙事，又有生活化的微观视角；既有壮阔历史的庄严，又有引人入胜的复杂情节；既有戏剧冲突，又有真实质感，让今天的新青年理解百年前先辈的理想和信仰，感受他们的生命激情和精神气质，激发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体现了红色题材重大主题作品的生命力。

电影《1921》呈现开天辟地的会议主题是基于历史的事实，电视剧《叛逆者》展开惊心动魄的谍战情节是依靠艺术的虚构，而这两部作品为何具有打动人的艺术震撼力？都离不开成功的人物塑造：贴近革命者的心灵世界，倾听他们心潮的澎湃，理解他们的情感和理性、信仰和理想，以及行为逻辑和个性。于是他们血肉丰满地活了，不仅仅留存于历史和荧屏上，而且亲近地走向观众的身旁，成为可以对话与交流的对象。观众被这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叙事感染着，展开了内心的对话：我们仰望着你们看过的星星，脚下的大地已换了新貌，多想让你们看看百年后的中国有多么美好……

### 讲述关键历史，创作的原始驱动力是人物

影片《1921》既有严肃正剧的庄重，又有惊险类型片的跌宕，不同于“编年史”的纵向叙事，而是从历史“横截面”切入，回望建党前后的时代风云，既有国际国内的开阔视野，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置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背景之下，将国内各类思潮、学生运动、工人罢工结合在一起，对建党的历史必然性有着全景的表现；同时又高度聚焦“1921”“上海”“中共一大召开”这三要素中的人物。

“再一次讲述那段关键历史，我们创作的原始驱动力，就是人。100年前那群人的情感、思想、理想。”怎样用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来呈现建党历史，打开人物的内心世界？黄建新导演使用现代电影的方式，对历史大事件中人物的成功塑造，成为电影的重大突破；这部《1921》是2021年语境下的1921。

《1921》不是以单一视角结构全片，而是不断切换着主观视角来吸引观众，电影的主观视角流露着浓郁的情感，人物的青春感和历史生活质感，让当代观众更有代入感。

电影以宏观视野中“小处落笔”的微观视角，以李达夫妇参与中共一大会议的筹备、召集与组织为主线，来叙述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电影一方面写实地呈现他们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开会的通知、联系开会的地址、开会的过程和最后的转移；一方面生动地勾勒出李达的心路历程，将人物的内心成长，汇入时代发展的洪流，通过人

物的思想脉络，向观众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与目标。

李达与王会悟的生活犹如革命与青春的交响乐，有动荡、艰辛的快节奏，又有温馨与相知的慢抒情，他们简朴又诗意的婚礼由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主持，他们的外语学社课堂遭遇搜查时，革命者快速解散和转移，他们在细雨中搬家，迎面相遇骑警时，机智地拿出结婚证，保护了进步书刊。王会悟在为一大代表寻找住宿时，李达帮她“演习”了多次，最后成功借宿博文女校。李达赶到印刷厂，请求工人将《共产党宣言》排版的“百姓”换成“人民”。李达熬夜写好《共产党纲领》后，他兴奋得跳出老虎天窗，站在上海的屋顶上，身后是朝晖满天，他张开双臂呐喊，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些内涵丰富的细节，鲜活地呈现了历史真实，生动地刻画了人物，让当代观众与先贤心灵相通，理解他们的初心与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一个青春的政党，13位会议正式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电影以诗意的青春审美刻画人物群像，突出了他们的青春气息；不仅起用了青年演员出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剧情设置上，在写实与抒情结合的电影基调上都洋溢着青春之美。

青年毛泽东的出场形象就是1921年的新青年，他在上海街头奔跑的一幕，更是跑出了昂扬的青春感，也是影片的重头戏。他被法租界欢庆法国国庆的人群吸引，却被阻拦在进入庆祝现场时……他在霓虹闪烁的街头奔跑起来，影片以蒙太奇的手法，将他在少年时被父亲逼迫，在长沙反军阀的场景区交替剪辑，揭示了人物奔腾的思绪：中国人何时能骄傲地为自己的国家庆生？那应该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奔处理想的形象呼之欲出：20世纪的夸父追日！

青春的岁月里当然有爱情，影片里有李达和王会悟的新婚燕尔，还有毛泽东和杨开慧恋恋不舍。青年毛泽东向杨开慧挥手道别与何叔衡一起赴上海参加一大会议，毛泽东与杨开慧目光之间的亲昵自然地流露着彼此心中的依恋，这是革命者在奔赴使命时的生离；当29岁的杨开慧为光明未来而喋血大地壮烈牺牲时，她青春的目光最后聚焦的是她心里的润之哥，这是革命者以生命捍卫信仰时的永别。

杨开慧曾对毛泽东说：“人生好短，短到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今天的付出还有意义吗？”他坚定地回答：“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即便是一无所获，也值得。”毛泽东的誓言也是杨开慧的选择，他们是志同道合的革命爱侣，他们真挚的爱情，坚定的信仰凝聚着青春生命的人性之美，激发着当代观众深切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 展现林楠笙叛逆黑暗 奔赴光明的心灵史

《叛逆者》以1936年到1949年



制图：李洁

《1921》不是以单一视角结构全片，而是不断切换着主观视角来吸引观众，电影的主观视角流露着浓郁的情感，人物的青春感和历史生活质感，让当代观众更有代入感。上图为电影《1921》剧照。

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为背景，以全程高能的情感叙事，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展开了林楠笙十几年来经山历海出生入死的磨难，从南京、上海到香港、重庆，又重回上海，辗转不同地域不同考验中的成长，一腔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如何走出黑暗的魔窟，奔赴光明的彼岸；他从初抵上海时的不谙世事，在香港时的徘徊寻路，到重庆时的奔暗投明，重回上海后的百炼成钢……剧集对林楠笙心路历程的描摹细致而深入，构成了饱满而清晰的人物弧光。

复兴社上海站站站长陈默群选中了观察力和记忆力超群的林楠笙，将他从南京的军统特训班带回上海站。林楠笙被遭受严刑拷打的孩子惊骇到失语，更对自己以欺骗手段接近朱怡贞，企图挖出上线的特务行径感到可耻。

当朱怡贞处于被军统毁灭的危险时，他决定冒死销毁电台发报的证据，这是他逃离黑暗的第一步，而他奔赴光明的关键一步是在香港重伤初愈离开医院之后，当他从电台听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犹如在暗夜行走，看见了指路的灯塔。他治好了穿肺之伤，整理了内心世界，前往重庆，试图营救对他有救命之恩的顾慎言。

无论对国民党中枢之地重庆的人心涣散，还是从上海站陈默群与王世安

所作所为，林楠笙彻底认清了所谓“党国”与“军统”的腐朽本质，也真正理解了共产党的崇高信仰。一面是不择手段的威逼利诱；一面是想要竭尽所能唤醒民众；一面是相互构陷、排除异己；一面是牺牲自己，保护同志；一面是没有民族大义，没有节操地暗中勾结劣绅投敌，一面是奋不顾身地奋勇抗日拯救中国；一面是中饱私囊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面是不惜流血也要去创造公平、美好的新生活；一面是已坠入黑暗的深渊，一面是在创造光明的未来。林楠笙思考着自己过往经历的人与事，毅然决定以青春的生命奔赴光明的未来，他接续了“邮差”的重要使命，成为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战士。

《叛逆者》不同于一般的谍战剧，不是向外编织纷繁复杂的剧情，而是将所有紧张反转的剧情都围绕着人物的塑造、人物的命运，指向人物的困境、人物的选择、人物的情感，围绕着林楠笙在出生入死中的成长，在矛盾冲突中的选择，深度聚焦林楠笙叛逆黑暗追求光明的心灵轨迹。

演员朱一龙细致传神地演绎出人物丰富的心理层次，饱满的情感张力，让观众感受林楠笙经历了痛苦艰辛的探寻过程，才发现了正确的道路。他的叛逆是一种遵从内心的良知，坚守人性的选择，是

一种明心见性的成长，一种确立信仰的人生实践。他的同窗左秋明的牺牲非常惨烈，他宁愿流尽自己的鲜血，也绝不泄露机密和情报。足智多谋的“邮差”顾慎言为了保护党的重要情报线，不惜献出生命。他几次开导林楠笙：“信仰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和战斗中得到检验，最终方能达到坚定。”纪中原的沉着坚毅英勇无畏让林楠笙看见了信仰坚定的典范。从他们身上，他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信仰是那么光亮，可以冲破身边的黑暗，可以荡涤周围的污浊，疗愈他的迷惘，值得他用一生去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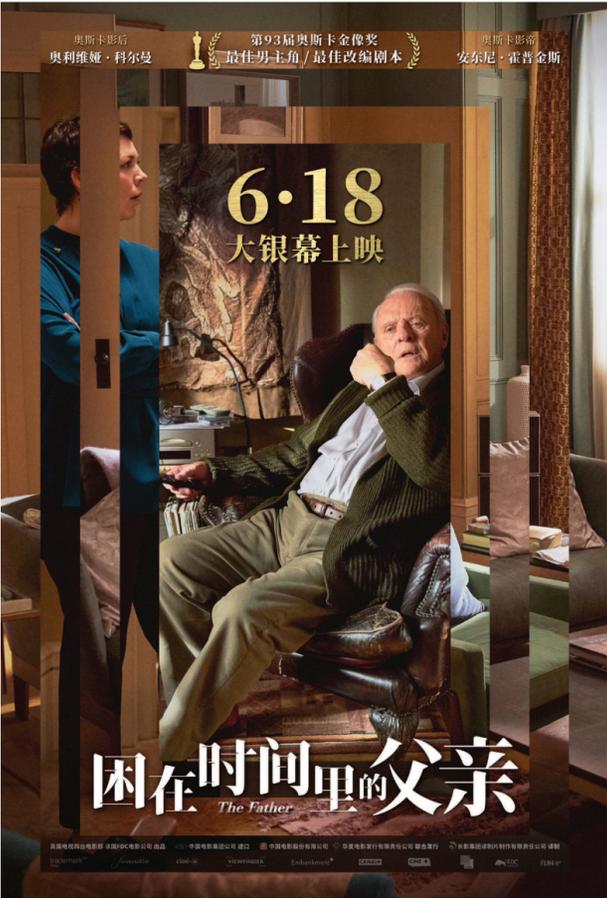
### “指楠贞”林楠笙与朱怡贞二人情感是塑造人物的点睛之笔

林楠笙与朱怡贞的情感是人物成长的重要线索，是贯穿全剧始终的重要线索，是成功塑造人物的点睛之笔，也是牵动观众心弦引发观众共鸣的情感源。他们第一次相遇时，她的清新和纯真吸引着他的目光和心灵，她的信念是推翻贫穷、苦难、压迫的旧世界，去创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他们第二次相遇时，她经过被捕的生死考验，革命斗争的艰险历程，一种信仰高于爱情的忠

诚，一种使命高于生命的勇敢，更让他敬佩不已，深爱无悔。

一刻也不曾放下，一句也不能不诉，林楠笙对于朱怡贞的爱，有着丰富的内涵，势必永存的魅力，这爱唤醒了他的良知，他开始了自我反省后的拯救行动，这是他奔暗投明的开始；这爱是舍生忘死的相互保护，在刺杀日寇的行动中，他们冷静机智死里逃生；又一次在敌人追杀的危急时刻，他们相互掩护，血染大地……这爱是时空无法阻隔的刻骨铭心的思念，伴随着他奔赴光明之旅中的每一个场域，每一段时光。观众含着眼泪沉浸在剧情中，关注着危险动荡中“指楠贞”的情感走向，牵挂着林楠笙和朱怡贞是否可以重逢？这是成功的人物塑造直抵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唯爱与信念永存！这是一种崇高而动人的情感美学！

《1921》与《叛逆者》以现实主义的写实，浪漫主义的想象，虚实相生、史诗互现地将革命者坚定的信仰，真挚的情感传递到当代观众的心里，产生深刻的内在应答和价值认同；他们成为我们前行中的精神路标，他们在沧海横流中尽显英雄本色，在英勇奋斗中尽显青春之美、人性之美，生命之美，他们的人生是献给信仰与光明的赞歌。



## “父亲”和《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 在混乱的时空中凝视生命

■本报记者 柳青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公映后，有年轻观众在影片相关的讨论区里写了条短评，意思是自己终于明白了祖父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后陷入混乱的时空感，那是一种何其无助和痛苦的生命体验。这条善感的评论击中了影片的内核；它呈现了女儿的困境，呈现了父女之间双向的温情和折磨，但它本质是围绕父亲的，围绕父亲特殊的生命体验，就像它的原名，比中文译名直白也直接，就是《父亲》(The Father)，是特定的“这一个”，也是延伸向更普遍生命体验的“这一类”——在个体生活所依傍的时间秩序崩溃以后，一个“迷失的病人”怎样叩问生命存在的本质。

关于《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对男女主角表演的赞美是很安全的，尤其是扮演父亲的安东尼·霍普金斯，是他把抽象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体验变成能让观众共情的直观感受。“表演”是显见的加分项，这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剧作的能量，或者说，浸润于“感动”的观众未必能抽离地意识到，导演用精密控制的剧作，为表演保障了能量辐射的场域。

影片导演弗洛莱恩·泽勒同时是小说家和剧作家，这部电影原先是导演创作于2012年的舞台剧《父亲》，从舞台剧到电影，泽勒没有贪图省事地“交给

演员发挥”。《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让人看到戏剧和电影互相借力的灵活身段，视听的介入，有效地取消了舞台的上场/下场和第四面墙，而仗仗于坚实的戏剧创作，影像仍可以完成内向的探索，在切割了社会语境的局限空间和局限的人物关系里，思辨生命的、存在的、人的本质。

与阿尔兹海默症题材有关的作品，大多重心在于“照顾者”一方，从人伦关系和更广泛的社会语境里探讨这个议题。《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却是一个反向操作，剧作展开了病人的行为轨迹，从日常的细节深入“疾病的隐喻”。它的核心情境看起来是寻常的护理困境——父亲和女儿之间、父亲和护工之间、父亲和女儿的家人之间，进而扩展到女儿和家之间。但是到最后，观众才会发现，以上的情境都是从父亲主观视角出发“构建”的，这是患病的父亲“感受”到的世界，而非客观发生的戏剧冲突。

事实上，观众是从“听觉”上开始整部影片观看体验的。电影开场，摄影机镜头在幽闭恐惧的室内缓慢行走，昏暗的空间里，悠然回旋着歌剧《采珠人》的咏叹调，在歌声戛然而止的一刻，年迈的父亲露面了，他戴着耳机，如陷孤岛。这部比才的歌剧是演员霍普金斯本人的挚爱，他出于私心，希望导演在影片里用这部歌剧作配乐。导演尊

重、也成全了老先生的心愿，并且歌剧的介入，灵巧地调度了电影视听的特性，根本性地改变了原舞台剧本的质地，给予这个作品一种自由流淌于现实世界和意识世界的结构。观众会在看完整部影片以后，时过境迁地回味到，《采珠人》的咏叹调把如同散珠的、碎片化的情境，串成完整的“串珠”般的作品。歌剧循环出现在父亲意识混乱的时刻，一次又一次，时间和空间丧失了秩序，错的人出现在错的时间和错的空间里，父亲的记忆是一堆零乱的拼图碎片。

影片打破了常规的线性叙事，但它既非插叙也非倒叙。电影的正式海报，提供了一幅具有强大信息量的画面表述：处在不同时空的父亲和女儿被嵌套在层叠的画框里，形成不存在的对话场面。比如影片里非常揪心的两场戏，一场是父亲开始认不出女儿的样子，老人茫然地等待购物的女儿回家，但观众看到开门的并不是奥利维娅·科尔曼扮演的女儿，她是谁呢？谜底到片尾会揭示，这个中年女子是疗养院里负责照顾老父亲的护工；另一场戏里，父亲在歌声里起床，听到女儿的声音却没有见到她，他走到客厅，傻乎乎的家政姑娘给他递上热茶，但这个段落从女儿的视角重演了一遍，她在厨房里看到睡衣凌乱的父亲，这时门铃响了，进来的不是家政女孩劳拉，而是疗养院的女护士凯瑟琳，父亲将被接走。在关键的情境里——父亲病情加重、女儿家庭矛盾爆发、送养院院的最终时刻，每一次导演都运用非常电影化的、纯视听的方法，强化了同一个空间里时间多线程的交叠和混乱。

对时空秩序理性有强迫症的观众，可以在影片结束后复盘时，拼接出情节的“原貌”：父亲在很久以前就失去了一颗女儿，剩下的那个女儿多年照顾患病的他，他逐渐丧失清晰的时空意识，继而记忆错乱，无法独立生活，女儿为了照顾他，结束了一段婚姻，但女儿无法挽回父亲迷失于混乱的意识中，因为无法兼顾个人生活与照顾父亲的重担，她把父亲送入疗养院，自己去巴黎开始新的婚姻、新的人生。

但是在这部电影里，情节清晰与否不重要，它也不叩问亲情的容忍度和医疗/社会层面的支持度。甚至，叙事的铺垫和翻转都无关悬念，它无关猜谜，只是纯粹地把观众拽入父亲的病体，去体验生命秩序崩溃后的混乱和未知。父亲丢失了手表，继而彻底丢失了他的时间，他沉沦在错乱的个人历史中。恰恰是这样，这部电影因为“向个体内部叩问”而得到升华：凝视着这段病患的痕迹，何尝不是凝视着人的存在本质，时间之于生命，是不是一种枷锁呢？